



主办:钱江晚报 华云文化

携新作《青花帝国》作客钱报读书会,江子说—— 青花瓷的江湖“水很深”

本报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5月25日晚上7点,著名作家江子携新作《青花帝国》作客杭州庆春路购书中心,应钱报读书会·华云文化咖之邀,与读者夜谈“青花”。

读书会还请到学者、杭州市博物馆研究员沈芯屿,作家苏沧桑,与读者一同分享交流。

1000多年前,宋真宗赵恒将年号“景德”赐予离京师千里之外的昌南镇,从此,改名换姓的“景德镇”开始了苦心孤诣的陶瓷艺术探索。

江子在年轻时与景德镇的交集其实不多,是过了而立之年才第一次造访,然后,他被瓷器这种带有几分“魔幻”的物什迷住了,开始笔耕三年。

对江子来说,瓷渗透在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它是我们的生活日用品,是盛饭、插画、装饰的物件,但同时也是一种哲学和艺术,它承载了诗歌的传统,也记录下历史。



的身份深入这个“水很深”的江湖,了解制陶繁复的工序,平衡无数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同时还要满足皇室对青花瓷的狂热向往。

景德镇的传奇人物之一,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周丹泉,他做的仿古瓷可以以假乱真,从造型、着色到裂纹都与古瓷如出一辙。江子说:有一次,周氏访友,仅仅短暂地把玩了朋友收藏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古代白定炉鼎,就用手指数量好了尺寸,背下了鼎纹样式,半年后,竟然就做出了与真品一模一样的戏仿之作。

这样传奇的故事,是否真实?江子回答,《青花帝国》是严格考据的结果,细节都是真实的。

40年前 杭州发现中国最早的元青花

苏沧桑说,自己在读完《青花帝国》后,静静地端详了家中藏有的青花瓷器。她回忆起二十年前,许多景德镇匠人来到杭州庆春广场,人们挑选着心仪的瓷器,带回家中成为藏品。

古陶瓷研究专家沈芯屿回忆,上世纪90

年代实习的时候,老师曾经集中讲过仿古的派别,那时不乏劣质的仿制品,比如采用机械拉胚、包浆,只能糊弄外行。

而现在的情况更复杂:明、清的青花瓷技术流传下来,因此现代的“高仿”青花瓷器制作工艺,从手工拉胚,到画师绘画,再到柴窑烧制,都很专业。沈芯屿说,现在的国际拍卖会上,照样会有青花瓷的赝品。

“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发现的最早的元青花,就在我们杭州。要探索元青花的起源,杭州这三件非常重要。”沈芯屿点出了杭州与青花瓷的渊源。

40年前,位于文三街的无线电学校宿舍工地发现了元代的墓葬,出土的8件文物中,包括3件青花观音塑像。

当时国内外哗然:因为文物上有确切的纪年。经过沈芯屿的多次考证,确定为1336年。

这3件高约20厘米的观音像,两侧立着善财童子和龙女,观音像上不均匀的“发(fā)色”(青花瓷器的青料—氧化钴,在高温窑内烧造呈现蓝色的过程),也给学术界研究尚未成熟的元青花烧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72道工序 留下无数传奇人物

如果要在72道工序划分下的无数青花瓷从业者中选出一个“中心人物”,来作为“主角”,江子会选谁?

江子给出两个候选人——

一是负责烧窑的工匠:“他是技术的核心,烧窑的火候、时间、节奏决定了瓷器的品质。”比如,传说中烧窑把桩的明朝景德镇工匠童宾,为了烧制口径三尺(约合1米)的御用“大龙缸”,不眠不休,最后竟投身入窑,完美的瓷器由此产生。

二是督陶官:“他是运营的核心,要和各方势力发生关系。”《青花帝国》里写清朝的五品官唐英被派往景德镇,以钦差、督陶官

“西湖之春”艺术节闭幕,获曹禺剧本奖的《大清名相》上演 以让地开头,写了“不让”的张廷玉

本报讯 5月24日晚,2018年“西湖之春”艺术节闭幕,压轴大戏——黄梅戏《大清名相》在杭州剧院上演。

《大清名相》虽是黄梅戏,却有着浓浓的“杭州血缘”。

一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杭州编剧界CP余青峰、屈翌洁夫妇,凭借戏曲剧本《大清名相》荣获了第六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第二十二届曹禺剧本奖)(注,实际演出时改名为《大清名相》)。

余青峰目前是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直属单位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的一级编剧。2008年凭《赵氏孤儿》剧本获得第十八届曹禺剧本奖,2014年凭《青藤狂歌》剧本再次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曹禺剧本奖,而《大清名相》,是他第三次获得曹禺剧本奖。

《大清名相》大改九稿,小改近20次,历时近两年。2015年创排以来,先后在全国各地演出百余场。

这一次,它算是回到娘家。

这部戏源自大家都熟悉的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吴家与张家为了一块宅地,争

执不休。张家人向在京城当宰相的张英求助。谁料想,张英的态度很明朗,不就是一块宅地吗?让他三尺又何妨。

但这部剧没有写张英的“让”,而是写了张英的儿子张廷玉,写了一个“不让”的故事。

谢幕时,很多人流泪了,余青峰也坐在观众席,这颗“光头”太显眼,以至于大家一找就找到了,第一时间跟他交流看戏的感受。

何为好戏,有各种评判标准,对于观众而言,最直接的反应,莫过于意犹未尽,急着找到相关的小说和文章“充电”。观众“大受”就是如此,她一看完就手机百度了张宏杰写的《饥饿的盛世》,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正好写到了张廷玉。她对记者说:“这部戏的呈现很干净,有文化深度,融汇了诗词文化中的一些精髓,引导人们去探讨历史。”

余青峰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这次,为什么又“绕远路”,去写张英的儿子张廷玉,要写“不让”?

“这个故事已经有过一个《六尺巷》的黄梅戏了,写来写去就是两家吵架。直到发现了张廷玉,康熙乾隆三朝重臣。我们从他的角

度重新去诠释这个‘让’与‘不让’,这里面具有反腐的时代意义。”

余青峰说,《大清名相》中的张廷玉为乾隆朝惩贪肃吏立下汗马功劳后,为了平息乱象,执意让贤还乡,最后连“太庙配享”的殊荣都让出来了。“他说我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只要你乾隆能够下大决心整顿吏治,我就回家赋闲。归去之前,当时很多事情全部被他揭出来了。所以我们最后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高风亮节,几十年不犯错的三朝老臣的让和不让。”

而余青峰的“不让”又是什么?

余青峰笑:“我不让的东西大概就是,不会随波逐流。我不会人云亦云。我宁可在家里享受着孤独,也不愿意融入外面的喧嚣,这大概只有像她(妻子屈翌洁)这样的人才接纳我。”

余青峰骨子里的这份叛逆,让同样文气的杭州人很懂他。“我敬畏古代文人,敬畏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些精神跟戏曲是比较契合的,也能跟我从小的戏曲情结结合起来,所以我的创作基本上是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子走下来,也会一直走下去。” 本报记者 马黎